

## 博士政策治理的演变：国际组织影响力的发展

提勒·托尼斯曼、马修·拉丰

提勒·托尼斯曼 (Teele Tönismann)：博士跨学科研究实验室、Adoc 人才管理公司的研究员、  
法国图卢兹政治学院社会科学实验室 (LaSSP) 成员

电子邮件：tonismann@adoc-tm.com

马修·拉丰 (Matthieu Lafon)：博士跨学科研究实验室、Adoc 人才管理公司的主任

电子邮件：ml@adoc-tm.com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特别是自博洛尼亚进程引入由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组成的三周期高等教育体系以来，各国政府逐渐加大了对博士教育的关注，而博士教育曾经主要被视为学术界的事务。

然而，还有另一个趋势较少被充分记录：即国际上，尤其是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以下简称为经合组织) 等国际组织对博士培训的日益重视。本文将探讨国际组织的最新政策倡议，并认为，这些组织在塑造研究生涯战略中的参与，正在改变博士政策的制度治理框架及其内容。

### 博士政策在科研职业规划战略中的兴起

要全面理解国际组织近期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回顾博士教育如何首次融入科研政策议题之中。

以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为例，这一案例极具说服力，因为它展示了从 2000 年代初开始的一个相当复杂的制度化过程。一方面，博士教育问题首次在国际层面上获得关注，是在博洛尼亚进程以及随后的欧洲高等教育区建立的背景下。这一备受讨论的政府间倡议旨在改善大学之间的合作、提升质量、促进流动性并提高毕业生的

就业能力。博洛尼亚进程除了在这些领域对博士教育产生积极影响之外，还推动了大学现代化议程，这一议程尤其得到了作为签署方和执行成员之一的欧洲委员会的倡导。

另一方面，博士教育在所谓的欧洲研究区 (European Research Area) 政策框架内也获得了发展动力。欧洲研究区是欧洲委员会于 2000 年启动的一项政策倡议，目标是使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知识型经济体”。欧洲研究区推动了欧洲委员会研究政策的显著增长，包括增加资金、增强工具以及在社会挑战和研究卓越方面的全新政策重点。欧洲委员会致力于建立单一市场，这凸显了对研究职业生涯采取更有组织方法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2005 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研究人员欧洲宪章》 (*European Charter for Researchers*) 和《研究人员招聘行为守则》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Recruitment of Researchers*)。虽然博士候选人仍被归类为学生 (因此隶属于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公共政策)，但他们现在被定义为“早期职业研究人员”，从而将研究职业政策与博士培养项目联系起来。

因此，通过认可博士生的工作和地位，这一分类变化使欧洲委员会得以确立其在博士领域的权威。自那时以来，在包括 2009 年

《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在内的各种政策倡议的推动下,欧洲委员会不断推动创建新的博士项目、建立联盟并促进研究领域的跨部门流动性。《里斯本条约》将研究政策确定为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共享权限,自此,欧洲委员会在博士教育领域不断推出新举措。

## 博士学位的市场化

将博士候选人归类为早期研究人员对国际组织中的博士政策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最近的政策举措便是这一影响的良好例证。

2023 年夏季,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推出了与促进研究人员职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博士生的职业生涯发展。首先,欧洲委员会提出了一套全面的措施,其中包括建议制定“欧洲研究人员职业发展欧洲框架”的理事会建议、创新的《研究人员宪章》(Charter for Researchers)和《研究人员欧洲能力框架》(European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Researchers, 简称 Research Comp),旨在促进研究人员的跨部门流动性。其次,经合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共同发布了一份文件,概述了即将建立的《研究与创新职业发展观察平台》(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reers Observatory)的基础概念,并进一步通过经合组织的建议,推动为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提供多样化的职业发展路径。

这些倡议主要聚焦于研究人员的职业发展,因此与博士生涯息息相关。此外,在探讨研究人员的职业生涯时,它们为博士培训建立了一个具体框架,政策行动应在此框架内展开。简而言之,政策文件在其主旨叙述中突出了对研究人员(包括博士生)支持严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向学术界以外的各

个就业领域过渡时。文件提出,博士学位应直接并无缝地为就业市场做出贡献。例如,在拟定的欧洲研究生涯框架中,国家被敦促“鼓励学术界、工业界、其他商业部门、公共行政部门、非营利部门以及所有其他相关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之间进行互动与合作,包括伙伴关系”,并确保“博士培训及有针对性的培训应基于各方实际技能需求进行开发或共同开发。”因此,博士教育的本质似乎不再局限于学术好奇心,而是超越了培养未来学者的传统职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工具和推动力。这种推理是现代新自由主义治理逻辑的典型特征,倡导国家在社会各个方面实施与市场相关的改革。

因此,在市场逻辑框架下,这些举措不仅仅是完善博士生涯轨迹的技术框架。它们还引入了认知维度,重新调整了社会对博士学位的认知,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广泛框架内。

## 软法规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最后,以上所描述的变化也引发了关于其对国家政策影响的讨论。

总体而言,政策建议、政策工具(如《研究人员欧洲能力框架》)和基准工具(如《研究与创新职业发展观察平台》)可以被视为“软法”措施,这是国际组织中常用的治理方法。该方法的主要目标是传播共同的政治目标和认知原则,而不是完全的政策统一或自上而下的实施。因此,软法更多依赖于模仿和同行评估,而不是正式的约束;它们允许不同国家对共同问题做出不同的响应。然而,据我们所知,关于博士培训的国家案例研究仅偶尔与国际组织层面上不断发展的政策建立联系。然而,考虑到欧盟和经合组织之间在政策模式和学术文化上的差异,这一

点至关重要。

理解国际组织的行动对于认识博士政策治理结构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这使我们能够关注博士培养角色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往往在更公开的关于研究生涯的讨论背后悄然发生。在就业市场要求提高就业能力的背景下，单一地强调就业市场的相关性可能会限制教育的更广泛目标，特别是在博士学位这样的高级课程中。

全面的教育一方面为博士生提供专业技能，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适应、创新并为社会做出有意义贡献的能力。因此，博士教育应寻求平衡，结合市场导向的实用技能与人文学习的基础。这种方法确保毕业生不仅能为就业市场做好准备，还具备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的智力广度。这样的综合教育不仅有利于个人，也能通过培养全面、具有社会意识的专业人士和学者来丰富社会。